政治科學論叢／第四十八期／民國 100 年 6 月／頁 33～62

從自民黨總裁選舉制度分析自民黨派閥勢力的形成與消長

吳明上*

摘　要

自民黨成立到二度下台爲止的約五十四年期間，除了短暫的二年三個月外，不論是自民黨單獨執政，或是組成聯合政權，自民黨的總裁同時擔任總理大臣，不僅是日本政治的最高領導者，而且掌握政黨與政府的龐大資源。自民黨政治家爲了爭奪總裁職位，集結成派閥，展開激烈的競合關係。因此，派閥勢力也成爲觀察戰後自民黨政治與日本政治的重要關鍵詞。

既往的研究將「總裁選舉」視爲被解釋項，用派閥的競合關係解釋總裁選舉中由誰勝出。然而，本文研究發現，派閥是總裁職位爭奪的產物，而其勢力亦將隨著總裁選舉的變化而出現消長的現象。

本文嘗試著從總裁選舉的實施過程中，對派閥勢力消長的影響，具有代表性的三個階段，亦即首屆總裁選舉、總裁初選制度的採用、第八十七屆的總裁選舉等時間點，論述自民黨派閥的成立，以及其勢力的消長，提供另一個觀察自民黨政治運作的切入點。

關鍵詞：自民黨總裁、派閥政治、政治改革、政治決定過程、保守政治體制

---

*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E-mail: meizyou@isu.edu.tw。

收稿日期：98 年 9 月 9 日；通過日期：99 年 8 月 12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前　言

自民黨於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成立，到二〇〇九年九月十六日的約五十四年時間，除了細川護熙內閣、羽田孜內閣，以及村山富市內閣等共計約二年三個月的短暫期間外，[1] 不論是自民黨單獨執政，或是組成聯合政權，自民黨的總裁同時擔任總理大臣，不僅是日本政治的最高領導者，而且掌握政黨與政府的龐大資源。自民黨政治家爲了爭奪總裁職位，集結成派閥，展開激烈的競合關係。自民黨派閥勢力的興衰直接牽動著自民黨政治與日本政治的變動，因此，派閥勢力是觀察戰後日本政治的重要關鍵詞。

既往的研究將「總裁選舉」視爲被解釋項，用派閥的競合關係解釋總裁選舉誰勝出。而本文則認爲，派閥是總裁職位爭奪的產物，而其勢力亦將隨著總裁選舉的變化而消長。

本文嘗試著從自民黨總裁選舉的三個階段，亦即首屆總裁選舉、總裁初選制度的採用、第八十七屆的總裁選舉等三個具有代表性的時間點，論述自民黨派閥的成立，以及其勢力的消長，提供另一個觀察自民黨政治運作的切入點。

貳、既有論點與問題意識

既有的論點是將總裁的產生視爲自民黨派閥政治的結果，而在總裁產生的過程中，派閥的合縱連橫，交織成日本政治權力的構圖。例如，長久研究自民黨派閥的伊藤昌哉便直言，在觀察戰後的日本政治時，無法忽視自民黨派閥的存在，而派閥對於自民黨總裁寶座的爭奪戰，則建構出戰後保守政治的基本架構。伊藤昌哉（1982；1985a；1985b）在一系列關於自民黨派閥的著作中，除了詳實地描繪出佐藤榮作之後，歷屆的總裁爭奪戰

[1] 村山富市內閣是社會黨、自民黨、新黨先驅等三政黨組成的聯合政權，首相職位是由社會黨的村山富市擔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外，更重要的是，分析了田中角榮總裁因爲「洛克希德事件」下臺並被逮捕之後，田中派如何在混亂的派閥政治中，取得政治的主導地位，建構出長期支配的構造（一九七八年末到一九八〇年代是「田中支配」與「竹下支配」的全盛時期，竹下派勢力承襲自田中派）。奧島貞雄（2006）與小堺昭三（2008）則追溯到自民黨創黨之初的總裁選舉，清楚地交代自民黨派閥的發展脈絡。[2] 其中，奧島貞雄（2006）更富含深意地指出，總裁爭奪戰實際上活化了自民黨政治與日本政治，歷屆自民黨總裁的更替形成日本政治「近似政權輪替」的效果，有利於自民黨建立長期的主導權。在審度「派閥政治」的優劣之際，一般容易存有權力鬥爭與政治利益分贓的負面印象，然而奧島貞雄則提供一個另類的正面思考。

野中尚人與石川真澄則進一步研究指出，自民黨派閥政治的精髓在於權力與利益的共享。野中尚人（2008：119）研究指出，總裁選舉後，主流派（總裁出身派閥及與其聯合的派閥勢力）與非主流派（或稱爲反主流派）共享政治權力與利益，而不獨占。例如，自民黨三役與內閣職位的分配方面，便是依照黨籍國會議員的黨政資歷依序遞補，同時顧及派閥勢力的均衡；一般對於日本內閣更迭與改組相當頻繁的現象產生不解的疑惑，答案其實在此。石川真澄（1978：191）則指出，派閥之所以成爲權力分享的單位，主要的原因是，掌握人事權的總裁／總理第一優先的考慮是黨內的安定與團結。一般而言，總裁派閥在黨內並無單獨過半數的優勢，因此，爲求黨內的團結及政權的穩定，總裁派閥必須求取包括非主流派在內的合作，以避免政黨的分裂，同時補強總裁的領導能力。

草野厚（2008：48-53）與足立利昭（1984：39-64）則進一步指出，自民黨是一個派閥的聯合體，派閥的關係除了合作外，同時也存在著競爭與對立的關係，但自民黨卻不因此潰散瓦解，執政利益是自民黨與派閥之間的有效黏合劑。

再者，既有論點也從「國會選舉制度」來論述派閥的形成。內田健三（1973：108-115）與川人貞史（2001：136-138）研究指出，因爲中選舉

[2] 奧島貞雄的著作涵蓋初代總裁到小泉純一郎時代，而小堺昭三則到中曾根康弘總裁，二者均有詳細的記載與紀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區制度是一個選舉區選出三到五個國會議員，所以大政黨（自民黨）在一個選舉區必需推出複數的國會議員，候選人的推薦成爲派閥競爭的場域，因此政黨成爲以派閥爲中心的組織，黨中央權力不強。再者，議員間的競合關係是以有力議員（派閥首領）爲中心形成的，而有力議員則以獲取總裁寶座爲目標，此競合關係有利於黨內派閥的發達。而建林正彥（2004：195-198）與齊藤淳（2005：203-207）則進一步指出，在實際的選舉實施過程中，同一個中選舉區中的自民黨候選人，彼此會爲了選票，進行勢力劃分，此亦有助於派閥勢力的溫存。然因國會議員總席次固定，且國會議員人數的多寡，意味著各派閥勢力的大小，因而候選人的提名作業成爲派閥政治的主要競技場。

然而，既有的論點存在以下二點問題。第一，除了國會議員選舉制度的分析外，既有的論點基本上將總裁的誕生視爲派閥的競合結果，而派閥的競合關係則建構出自民黨政治的基本架構。該論點是建立在「派閥已經存在」的既有事實之上，無法說明派閥爲何會成立。第二，國會選舉制度的分析觀點方面，雖然自民黨成立之際，已經採用中選舉區制度，自民黨內部也存在著多股勢力，但是該勢力並不具備「派閥」的條件，自民黨「派閥」的出現要到第二任總裁選舉時。因此，國會選舉制度的觀點出現了時間上的落差。

派閥爲何會出現？這是筆者最簡單樸實的疑問。事實上，從自民黨政治的過程觀之，自民黨派閥的出現是導因於自民黨總裁的選舉，亦即派閥的誕生是總裁選舉的果，而非其因。既然總裁選舉是派閥的主要成因，則在追究派閥勢力的變化時，總裁選舉便成爲關鍵的切入點。再者，總裁選舉制度的修改，又往往導致派閥勢力的消長。既有的論述將重點置於派閥在政治過程中的競合關係，而忽略了制度性的因素。制度與行爲者（政治家與派閥）之間存在著動態性的互動關係，彼此互爲因果。本文無意漠視或否認該因果關係，而是嘗試著從制度性因素來補充論述既有的研究成果。

基於以上的關心，本文嘗試著從總裁選舉實施過程中，對派閥勢力的影響具有代表性的三個階段，亦即首屆總裁選舉、總裁初選制度的採用、第八十七屆後的總裁選舉等時間點，論述自民黨派閥的成立，以及其勢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消長，提供觀察自民黨政治運作的切入點。

參、首任總裁的難產：創黨勢力的對峙

自由民主黨（以下簡稱自民黨）是由日本民主黨與自由黨合併產生，在合併前，兩黨內部各自已經存在多股勢力。兩黨勢力合併後，各該勢力並未整合成爲單一保守力量，黨內仍然群雄並立，甚至導致無法選出創黨的首任總裁。反觀，既然既有的各股勢力相互對峙，又爲何會合併爲單一政黨？換言之，爲何自民黨成立之際，便已經存在多股勢力並存，並蛻變成爲派閥的因素？

一、保守勢力集結的要因

就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而言，促成日本民主黨與自由黨合併的要素有三：一爲社會黨勢力的躍進；二爲財界的壓力；三爲三木武吉的主導。

首先，關於社會黨勢力的躍進方面。戰後，日本的革新勢力（日本社會黨）在眾議院席次的增加，是促進保守勢力團結的重要因素。日本社會黨成立於一九四五年，並於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五日的第二十三屆眾議員選舉中，一舉獲得 143 席次，較日本自由黨的 131 席次、民主黨的 124 席次高出不少，雖未掌握單獨過半數，但卻是眾議院的第一大黨，並與民主黨、國民協同黨等組成聯合政權（片山哲內閣）。爾後雖然因爲社會黨內部的左右勢力嚴重對立，一度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三日的眾議員選舉中，僅獲得 48 席次，勢力大幅滑落；最後因爲對於舊金山講和條約與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的立場形同水火，分裂成爲左派社會黨與右派社會黨。[3]

但是，進入一九五〇年代之後，左派社會黨與右派社會黨在眾議院的席次再度出現大幅成長的情勢。左派社會黨在分裂之後，雖僅維持 16 席次，但是在一九五二年的眾議院選舉中一舉獲得 54 席次，在一九五三年的眾議員選舉中增加爲 72 席次，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的眾議員選

[3] 右派社會黨贊成舊金山講和條約，但是反對美日安全保障條約，而左派社會黨則對於此二條約均持反對立場。日本社會黨秉持擁護和平憲法的立場，主張「非武裝的和平」，認爲美日安全保障條約屬於軍事同盟條約違反憲法的規定而極力反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舉則更增加爲 89 席次。右派社會黨則從 29 席次出發，在一九五二年增加爲 57 席次，一九五三年再增加爲 66 席次，一九五五年則爲 67 席次（田中善一郎，2005：17-41）。

左派社會黨及右派社會黨在國會席次大幅增加之下，再度大步接近執政的局面，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三日社會黨再度統一成爲一個政黨，並由左派的鈴木茂三郎擔任社會黨委員長，確立左派主導的社會黨體制。統一後的日本社會黨握有 156 席次，較日本自由黨的 112 席高出許多，雖然較眾議院最大政黨的民主黨的185席少許多，但是在社會黨勢力躍進的趨勢下，日本的保守政黨，特別是執政的民主黨對於政權的運作倍感威脅。

其次，關於財界的壓力方面。戰後日本的財界期盼保守政黨能夠整合成一個政黨，主要基於兩個理由。第一是關於政治獻金方面，戰後日本財界對政界提供政治獻金，是以對具有外交手腕的政治家爲對象開始的。例如，宮島清次郎（日清紡織會長，吉田茂的東京大學同學）、小林中、櫻田武、永野重雄等財界新主流集團主要以吉田茂及自由黨政治家爲政治獻金的提供對象（富森叡児，1994：103）。但是，財界與個別政治家之間的金錢流通，容易造成腐敗與官商勾結的弊端。例如，一九五四年一月爆發的「造船疑獄」事件，[4] 便是最好的例證，因此財界期望對政界的政治獻金能以政黨作爲單一的管道。

第二是期望促使政治社會的安定。戰後日本的經濟在韓戰的「特需」下出現復蘇，並帶動一九五〇年代開始的高度經濟成長。財界爲了維持並擴大經濟的高度成長，期盼政局維持穩定並保持社會的安定。而且，戰後日本的經濟體制在美國的佔領改革以及吉田茂的美國路線主導下，自由主義經濟體制已經逐漸在日本落實，日本也成爲西方陣營的重要成員。財界對於左派勢力主導的社會黨存在著警戒意識，同時對於自由黨內部吉田茂

[4] 東京地方檢察廳特別搜查部於 1954 年 1 月開始對造船、海運業展開賄賂事件的調查，隨著案情的急轉直下，被逮捕的政治家、財界、官僚人士共達 71 名之多，是導致吉田茂內閣下臺主要因素。當時的執政黨自由黨的幹事長佐藤榮作一度被東京地方檢察廳特別搜查部列爲逮捕對象，後因首相吉田茂指示法務大臣犬養健介入，阻止佐藤的逮捕行動，同時吉田首相也拒絕在眾議院接受相關質詢，政治力量介入司法調查的例子是日本政治史上的不名譽事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鳩山一郎的對立，造成保守勢力的內耗感到憂心，呼籲保守勢力團結一致（岡義武，1966：228）。例如，日本經濟四團體（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日本商工會議所、經濟同友會、日本經營者團體聯盟）在日本社會黨統一的前夕，於一九五五年十月三日召開緊急會議，向日本民主黨及自由黨提出「捨小異就大同，團結黨內，全力促進具有責任感的安定政權」的呼籲（白鳥令，1977：41-44）。

最後，關於日本民主黨總務會長三木武吉的主導方面。日本民主黨於一九五五年的眾議院選舉後成爲第一大黨，黨魁鳩山一郎組閣後不久，作爲鳩山一郎心腹的三木武吉便呼籲保守政黨的集結。三木武吉懷有強烈的反共產主義情結，早在一九四六年戰後的第一次眾議院選舉中，目睹社會黨與共產黨在席次上的躍進，便開始懷抱著強烈的危機感。三木武吉表示：「除了部分個人情緒性與感情外，日本民主黨與自由黨均強烈地企盼保守政黨的團結。保守政黨團結的時機已經成熟，而其形態不論是合併、組成聯合政權，或是相互提攜合作均無礙。若有必要，鳩山內閣將會總辭職，並選出眾望所歸的新任總理大臣（富森叡児，1994：98-99）。」自由黨總裁緒方竹虎對三木武吉的呼籲表現出正面的回應，就在雙方的共識下，民主黨的三木武吉、岸信介（民主黨幹事長），自由黨的大野伴睦（自由黨總務會長）、石井光次郎（自由黨幹事長）等四人於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三日開始展開綿密的協商，最後催生了自由民主黨的成立。

日本民主黨與自由黨於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合併成立自由民主黨，簡稱自民黨。在東京都神田區中央大學講堂舉行的成立大會講臺上，日本民主黨總裁鳩山一郎與自由黨總裁緒方竹虎雙雙握手祝賀，瞬間全場歡聲雷動，長期主導戰後日本政治的保守政黨於焉誕生。成立之初的自民黨擁有眾議員 298 名（總席次 467 席），參議員 115 名（總席次 250 席），總席次 413 席，是戰後以來最大的保守政黨（舛添要一監修，1995：66）。[5]

[5] 值得注意的是，參議院因爲選舉制度的關係，需要跨派系的支援，所以自民黨參議員並非直接隸屬眾議院的派閥，而是以清新俱樂部、瑞穗俱樂部、懇話會等三集團爲主要的組織，不同於眾議院以政治家姓名爲派閥名稱（例如佐藤榮作領導的派閥稱爲佐藤派）。自民黨參議員直到 1960 年代後期才融入眾議院的派閥（佐藤誠三郎、松崎哲久，1986：242），因此，自民黨成立初期的派閥勢力是以眾議院議員爲中心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自民黨的成立過程觀之，促成自民黨成立的主要力量來自於「外部」的壓力，以及擔憂左派優勢政權的出現，並非因爲兩黨志同道合的結盟，因此，兩黨勢力的對峙關係，並未因爲單一政黨的成立而消失，此也是自民黨成爲派閥集合體，「分權式組織」的肇因。

二、合併爭端：首任總裁的難產

日本民主黨與自由黨在自民黨成立大會前，除了黨則、綱領、政策與組織綱要外，對「總裁公選規程」也達成共識，並於成立大會中通過。「總裁公選規程」主要的規定有三：一爲總裁任期 2 年；二爲總裁選舉的候選人由黨籍國會議員互選產生；三爲總裁選舉由黨籍國會議員以及都道府縣等地方黨部代表各 1 名進行投票產生，獲得過半數的候選人當選；若是第一輪投票結果，沒有候選人獲得半數以上選票者，則由票數領先的前兩位候選人進行決選投票。假若決選投票時，參選的兩位候選人票數相同時，則由「總裁公選管理委員會」的委員長抽籤決定（奧島貞雄，2005：26）。

雖然，總裁公選規程明確地規定了總裁選出的步驟與方法，但是，日本民主黨與自由黨卻因各有盤算，導致在自民黨成立大會上並未產生政黨領導人——「總裁」。日本民主黨強烈主張應透過協商管道產生總裁，而總裁應由鳩山一郎擔任，其理由主要有二：一爲日本民主黨擁有 185 個席次的眾議員，較自由黨的 114 席高出甚多，故協商對日本民主黨較有利；二爲在自民黨成立前夕，日本民主黨魁鳩山一郎因中風而半身不遂，若是經由總裁公選機制產生，恐因鳩山一郎的健康問題而對日本民主黨不利。反之，自由黨的吉田勢力提出「總總分離」原則，亦即鳩山一郎擔任總理大臣，而緒方竹虎則擔任自民黨總裁的意見，但是遭到日本民主黨的拒絕。自由黨進而主張第一代總裁應依照「總裁公選規程」的規定選舉產生，並推出緒方竹虎競選第一代總裁（足立利昭，1984：21-23）。

日本民主黨與自由黨對於總裁人事問題雙方對立激烈，互不相讓，直到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的新黨準備會成立時，仍然無法達成共識。最後因爲成立大會在即，雙方最後達成以下三點妥協事項：一爲延期總裁公選，第一任總裁於下屆臨時大會選出；二爲成立總裁代行委員會作爲暫訂措施；三爲鳩山一郎繼續擔任總理大臣。總裁代行委員會委員共計 4 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日本民主黨及自由黨各推派 2 名擔任，分別是日本民主黨的鳩山一郎首相與三木武吉，以及自由黨的緒方竹虎與大野伴睦（岸信介，1983：207-211）。

肆、派閥登場：權利共用結構的奠基

一、第二任總裁選舉：石橋湛山的逆轉勝

自民黨第一次依照總裁公選規程選出總裁是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的第二次自民黨臨時大會。但是，當時因爲緒方竹虎已於一九五六年一月因病猝死，鳩山一郎的有力競爭者消失，加上原自由黨陣營的大野伴睦轉而投奔鳩山陣營，因此總裁公選形同對鳩山一郎的信任投票。鳩山一郎在有效票 413 票中，獲得 394 票，高票當選自民黨第一任總裁。然而，鳩山一郎因健康不佳，加上盟友三木武吉於一九五六年七月四日去世，鳩山一郎在遭受打擊下萌生退意，因而在訪問蘇聯後，於第三次自民黨臨時大會上正式表明辭意。

在鳩山一郎的引退下，自民黨幹事長岸信介、自民黨總務會長石井光次郎、通商產業大臣石橋湛山等 3 名政治家表明出馬角逐總裁寶座。因爲鳩山一郎未指定繼任人選，導致選舉過程更形激烈。

岸信介在首相官邸所在的永田町設置競選總部，並以川島正次郎爲首，聯合椎名悅三郎、南條德男等政治家展開競選工作。岸信介因爲擔任幹事長，掌握政黨的巨大資源，吸引了更多的支持者。例如，河野一郎集結鳩山勢力成立河野派，更聯合田中角榮、保利茂、橋本登美三郎等政治人物，公開支持岸信介，佐藤榮作雖然出身吉田勢力，但是作爲岸信介的胞弟，無法割捨血緣關係，亦投奔岸陣營。石井光次郎則於赤坂設置競選總部，池田勇人集結前尾繁三郎、大平正芳、鈴木善幸等池田派勢力支持石井光次郎。石橋湛山則將競選總部設於日比谷的日活會館內，並以石田博英爲軍師，集結了大野伴睦、三木武夫、河本敏夫，以及中曾根康弘、園田直等年輕的政治家（奧島貞雄，2005：28）。

依照「總裁公選規程」的規定，第一輪獲得過半數選票者獲勝，若第一輪無獲得過半數選票者，則由票數領先的前兩位候選人進入決選。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參選的三陣營紛紛展開多數派工作，而在多數派工作的進行過程中，金錢的疏通與內閣職位的承諾成爲換取選票的有力籌碼。誠如宮坂正行（1973：107-108）調查指出，總裁選舉過程中，政治資金大量橫行，預估多數派工作資金多達三億日幣，而且也出現同一個內閣職位承諾給予多名國會議員的現象。小堺昭三（2008：48-83）以「金錢政治的起點」形容此次的總裁選舉。

從國會議員的支持態度觀之，岸陣營位居優勢，而石井與石橋陣營則居於弱勢。石橋派爲了阻止岸陣營在第一輪就獲勝，同時企圖在第二輪能夠逆轉勝，故在軍師石田博英的策劃下，對石井陣營展開「二、三位聯合工作」。總裁選舉前夕，石田博英前往會晤三木武夫與石井陣營的池田勇人，展開秘密會談，達成以下協議：假若總裁選舉進入決選階段，則雙方將票數集中投給在第一輪獲得較高票數者；而最後若是能夠勝選，則提供合作者將取得副總理職位（石川真澄，1984：45）。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四日進行的自民黨總裁選舉開票結果，恰如石田博英所預估的，岸信介雖然獲得最高票數 223 票，但是卻未能過半數；石橋湛山獲得 151 票，而石井光次郎則獲得 137 票。緊接著進行第二輪的決選投票，結果石橋湛山獲得 258 票，較岸信介獲得的 251 票僅僅高出 7 票，石橋陣營取得逆轉勝。[6]

雖然石橋湛山獲得勝利，但是因爲事前過多的承諾，導致組閣出現膠著狀態，甚至組閣之初，石橋總理一度兼任所有內閣職位的異常狀況。例如，石橋總理邀請岸信介入閣時，岸信介反對石井光次郎入閣，因此事前承諾的副總理職位便無法實現；此外，幹事長（三木派首領三木武夫）、大藏大臣（池田派首領池田勇人）、內閣官房長官（石橋派石田博英）等人事案是在內閣成立後的第三天才確定，而郵政大臣（無派閥的平井太郎）、北海道開發廳長官（無派閥的川村松助）等人事案要到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才定案，防衛廳長官（無派閥的小瀧彬）則要到翌（一九七五）年的二月二日才定案（內田滿，1987：182-183）。

---

[6] 石橋湛山與石井光次郎於第一輪的總得票數爲 288 票，而石橋湛山在第二輪獲得 258 票，顯然出現 30 票的「造反票」。反之，岸信介在第二階段比第一階段多出 28 票，與石橋戰營的 30 票相差無幾，顯見選舉競爭的激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雖然石橋內閣的組成過程不順遂，但是從內閣職位的佈局觀之，卻也建立起「權力共享」的基礎，並成爲爾後自民黨政權內閣職位分配的模式。石橋內閣的黨政人事分配方面，黨三役的幹事長、總務會長、政調會長，分別由三木派的三木武夫、河野派的砂田重政、石井派的塚田十一郎擔任；而內閣職位方面，石橋派、池田派、三木派、大野派、石井派、岸派、河野派、中間勢力等則分配到的內閣職位數分別是 2、1、3、2、2、3、1、2，形成權力共享的局面。石橋甚至邀請勁敵岸信介入閣，並開啓岸信介「繼任」總裁／總理的道路。

石橋內閣的組成，意味著戰後保守政黨依照年齡、黨齡、黨政資歷的「長老支配體制」的結束，開啓了以資金力量、個人魅力、個人政治實力爲中心的「實力者時代」（足立利昭，1984：104）。而依據「派閥勢力」分配黨政人事模式的確立，則要到佐藤榮作三度當選總裁之後（佐藤誠三郎、松崎哲久，1986：67）。

二、「派閥」的登場

在此次的總裁選舉過程中，自民黨內部的「派系」發生質變，蛻變成爲「派閥」。依據內田健三（1973：49-50）研究指出，除了勢力集結（派系）外，「派閥」尚須具備以下五個條件：一爲派閥首領須具備強大的資金募集能力，特別是資助成員參加國會議員選舉；二爲派閥首領必須具有取得總裁寶座的魅力；三爲派閥首領須深具黨政資歷的政治家；四爲派閥首領具備爲其成員斡旋爭取內閣職位的能力與份量；五爲派閥首領具備政治的領導統禦能力，團結派閥成員發揮應有的影響力。

總裁選舉中，既往的「志同道合的夥伴關係」，轉變成「首領與成員的上下關係」。角逐總裁的三方陣營在推動多數派工作之際，均以派系首領做爲競合的窗口。不論是政治資金的疏通，或是黨政職位的斡旋，都是以首領爲中心進行，強化了首領的領導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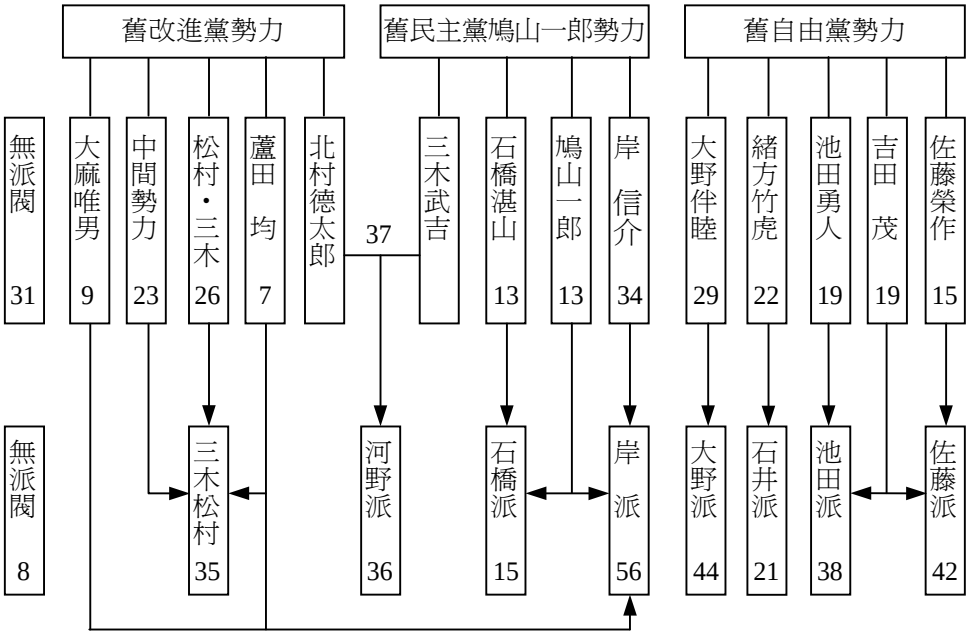
更重要的是，派系之間的合縱連橫與整合，建構出自民黨派閥的基本架構。自民黨組成之際，內部存在著十四個派系。亦即，自由黨內部有吉田茂、佐藤榮作、池田勇人、緒方竹虎、大野伴睦等派系；而日本民主黨內部則有鳩山一郎集團與併入日本民主黨的改進黨集團，前者又可包含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山一郎、三木武吉、石橋湛山、岸信介等派系，而後者包含北村德太郎、大麻唯男、蘆田均、中間勢力與三木松村（三木武夫與村松謙三）等派系。然而，當時派系的團結力量尚未強固，部分成員同時分屬多數的派系（福井治弘，1969：89-92）。

而在總裁爭奪戰的過程中，十四個派系出現離合聚散的情形（請參酌圖 1：自民黨派閥原型圖）。吉田茂派系因分裂消失，成員分別加入佐藤派與池田派；鳩山一郎派系則因爲鳩山的下臺而分裂消失，成員分別加入岸派與石橋派；三木武吉與北村德太郎的派系合併爲河野派，蘆田均、改進黨中間勢力及松村三木派等三派系則合併爲三木松村派，大麻唯男派系則併入岸派。十四個派系整合成爲八個派閥，大眾傳播媒體與學術界將之稱爲「八個師團」，是自民黨派閥勢力的原型（佐藤誠三郎、松崎哲久，1986：240-242）。

圖 1　自民黨派閥原型圖



註：「數字」表示派閥的當時擁有國會議員勢力。
資料來源：佐藤誠三郎、松崎哲久（1986：2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值得一提的是，總裁選舉的舉行產生了派閥，反之，派閥的勢力亦將因總裁選舉的結果而消長。石橋派因爲石橋總裁就任僅二個月便因病去職而解散，石井派的首領石井光次郎於一九五七年及一九六〇年出馬角逐總裁寶座連續失利之後，石井光次郎從政界引退，石井派之後不久隨之解散，併入三木派；大野派首領大野伴睦雖然二度就任副總裁，[7] 然終究無緣總理職位，大野伴睦於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因心肌梗塞去世後，大野派也隨之分裂成爲船田派及村上派。船田派及村上派因爲一九七八年總裁選舉失利而解散。

「八個師團」演變成池田派、佐藤派、岸派、河野派、三木派等五大派閥，而其延續勢力雖然經過自民黨下野、自民黨再度執政、自民黨再度下野的重大變化，甚至演變成爲七大派閥，但仍然是主導自民黨政治的主要力量（參見圖 2：自民黨主要派閥的變遷）。

伍、總裁初選制度的採用與制度的反效果

自民黨臨時大會於一九七七年四月決定採用「總裁初選制度」，大幅度地修改總裁選舉制度，致使派閥政治產生重大的變化。既往，自民黨總裁是由黨籍國會議員及自民黨都道府縣等地方黨部代表投票產生，而「總裁初選制度」則是將選舉權擴大到自民黨全體黨員與黨友。黨友是指黨友組織「自由國民會議」[8] 與「國民政治協會」[9] 等二組織的成員而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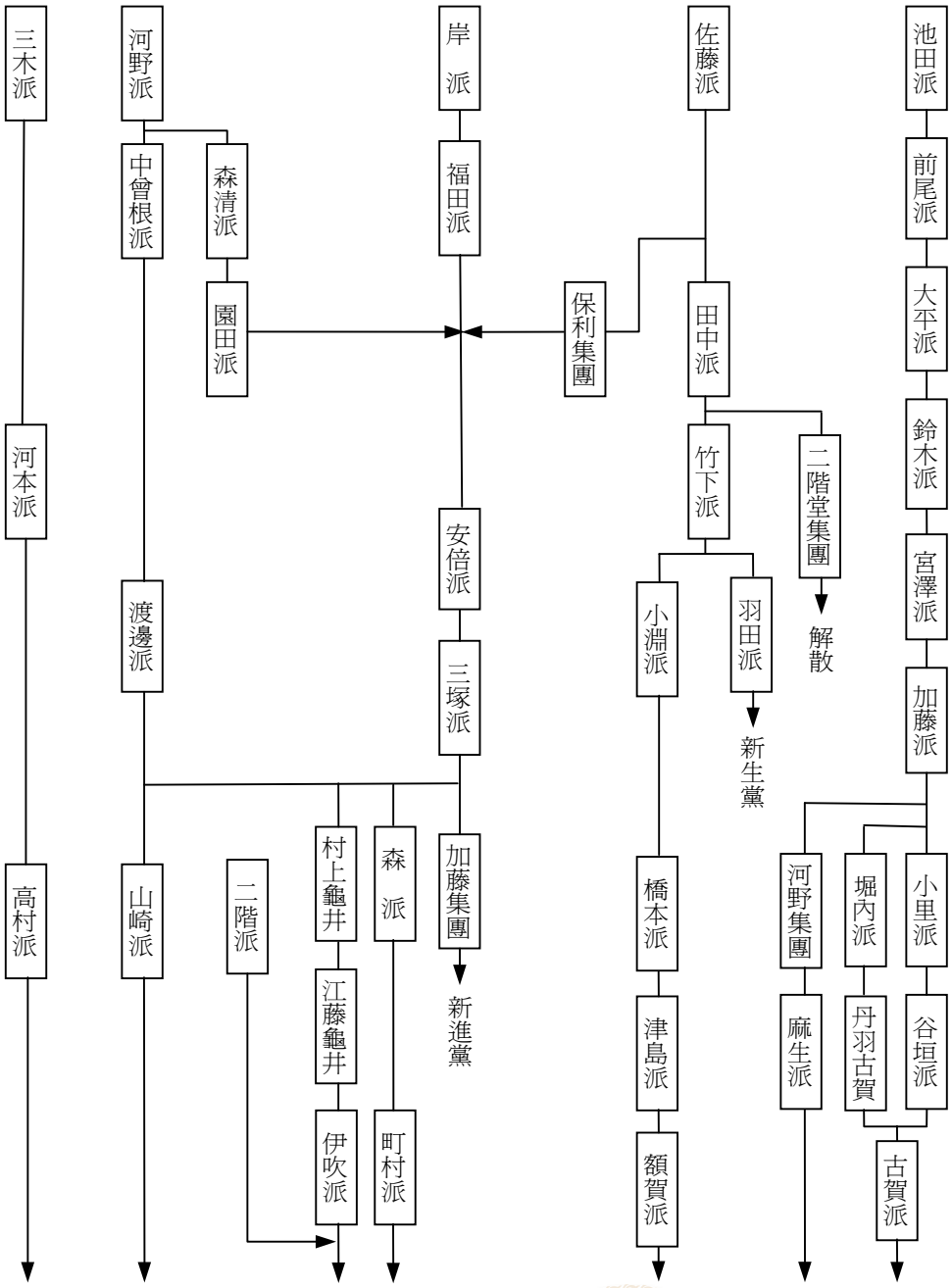
7 大野伴睦擔任於 1957 年擔任過初代副總裁，1961 年接近池田總裁而再度擔任副總裁。

8 全稱爲「維護自由社會的國民會議（自由社会を守る国民会議）」，是福田赳夫於 1977 年 7 月成立的組織。學術界與文化界人士在立場上較難以加入政黨來表示對該政黨的支持，而「國民會議」的成員則以此些領域的人士爲主，藉以擴大對自民黨的支持。第一任代表是作曲家黛敏郎。

9 國民政治協會成立於 1961 年 7 月 15 日的財團法人，主要目的是匯總企業對自民黨的政治獻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2　自民黨主要派閥的變遷



註：作者自行整理（二〇一〇年五月當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為何採用總裁初選制度

根據「自由民主黨則」及「總裁公選規程」的規定，自民黨總裁的誕生方式有二：一爲公選制度，二爲兩院議員總會選舉產生。首先，公選制度是由黨籍國會議員（眾議員及參議員）與地方黨部代表投票產生；其次，根據自由民主黨則第六條第二項的但書規定，總裁於任期中出缺並有急迫需要時，得由「兩院議員總會」取代黨大會票選產生總裁。而根據總裁公選規程第九條的規定，只有黨籍國會議員才能出馬競選總裁。[10] 自民黨從一九五六年四月到一九七六年十二月期間，總計誕生十三任的總裁，其中的十任依照總裁公選規程方式選出，其餘三任則由「兩院議員總會」選舉產生。雖然總裁選舉方式有二，但實際上，國會議員票數的多寡是總裁選舉勝敗的關鍵。換言之，總裁選舉前，派閥的多數派工作便已經決定了總裁選舉的結果。

然而，實施長達二十年的總裁選舉制度，爲何要在一九七七年進行重大改革？究其原因主要是自民黨面臨以下兩個困境，企圖藉由改革來穩固自民黨的政權運作。

第一是自民黨政權面臨嚴重的挑戰。首先是自民黨出現金錢政治體質的弊端。田中內閣大力推動「列島改造計畫」之際，作家立花隆（1974：92-131）在《文藝春秋》發表〈田中角榮研究：其金脈與人脈〉一文，揭發田中角榮的政治資金問題，引發政壇震撼，導致田中首相的下臺。而在田中下臺之後，一九七六年更爆發「洛克希德案件」，田中角榮因收賄而被逮捕。同時，自民黨因爲一連串的金錢醜聞事件，逐漸失去選民的支持。例如，自民黨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五日的眾議院選舉大敗，便是最明顯的例子。一九七六年的眾議員選舉中，雖然席次從 491 席增加 20 席，成爲 511 席，但是選舉結果，自民黨反而較上屆減少 24 席，僅獲得 249 席，失去過半數的優勢。自民黨在吸收保守系統的議員後，在新國會召集時才總算取得 260 席的過半數席次（田中善一郎，2005：111-112）。自民黨慘敗

[10] 自由民主黨則並未禁止參議員出馬角逐總裁寶座，然迄今尚無參議員競選總裁的例子。歷屆的總裁候選人中，宮澤喜一、石原愼太郎、藤井孝男、小池百合子等雖然曾經擔任參議員，但是出馬競選總裁時，均已改換跑道，以眾議員的身份參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後，河野洋平率領田川誠一等 6 名改革勢力離開自民黨，組成「新自由俱樂部」，是自民黨的第一次分裂，自民黨面臨創黨以來的最大危機（神島二郎，1985：185）。

其次是革新勢力的成長，導致國會出現「保革伯仲」（保守勢力與革新勢力不分軒輊）的局面，自民黨政權出現不安穩的狀況。眾議院選舉方面，從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二年與一九七六年的選舉結果觀之，自民黨分別獲得 288 席次、271 席次、249 席次，席次數目明顯地減少，逐漸喪失國會中的優勢。反之，公明黨在一九六四年成立之後，於一九六七年第一次參加眾議院選舉時獲得 25 席次，而在一九六九年時增加爲 47 席次，雖然於一九七二年的眾議院選舉時，一度減少爲 29 席，但是在一九七六年的眾議院選舉中獲得 55 席，成長幾近一倍。公明黨是一個「中道政黨」，因此在眾議院席次的增加，顯示出自民黨的偏右路線開始受到選民的質疑。而偏左的革新勢力，同時也是最大在野黨的社會黨，在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二年與一九七六年的眾議院選舉，分別獲得 90 席、118 席、123 席，席次數目出現穩定的成長。

另一方面，自民黨在參議院也逐漸失去優勢。自民黨在一九七四年的參議院選舉下，獲得 62 席的改選席次，總席次爲 126 席，而在野黨的總席次爲 124 席，朝野政黨的席次差距是 2 席，而上屆（一九七一年）的差距是 13 席；而自民黨在一九七七年的選舉下，獲得 63 席的改選席次，總席次爲 124 席，而在野黨的總席次爲 125 席，朝野政黨的席次甚至出現逆轉的現象。

第二是以自民黨爲首的保守政經體制面臨到瓶頸。戰後日本的經濟以韓戰的「特需」爲起點，開始出現高度成長的景氣，而在渡過岸內閣期間的「六〇年安保鬥爭」的紛亂之後，池田勇人及佐藤榮作等連續兩政權創造出長達 12 年的經濟高度成長，自民黨的保守政經體制出現了安穩的現象。但是，田中角榮上臺後，大力推動「日本列島改造」政策，引發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再加上石油危機的衝擊，以及經濟高度成長帶來的公害與城鄉差距的擴大，均使得保守的自由經濟體制出現閉塞的窘境（中村隆英，1993：579-6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三木總裁的改革建言

自民黨面臨上述的挑戰，急需採取變革措施，以促進自民黨的近代化。三木武夫首相在下臺前一周的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提出改革建言，推動了自民黨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三木建言」的主要內容有三：一爲改革的繼續推動，二爲掃除金錢體質與派閥政治，三爲實施總裁初選制度。

三木總裁認爲，內閣雖然是因眾議院敗選（一九七六年的選舉）而下臺，但是敗選的真正原因是自民黨的金錢體質、派閥鬥爭以及長老政治，自民黨爲了進行近代化的改革，必須將總裁選舉的投票權擴大到一般的黨員與黨友，以利接近基層民意。三木總裁認爲，將總裁選舉的投票權擴大到一般的黨員與黨友後，參與投票的「選民」人數大幅增加，將會使派閥在總裁選舉時失去著力點，因此能改善派閥政治與金錢體質的弊端，甚至進一步使派閥消失（井上義久，1979：9）。

福田赳夫繼任總裁之後，積極落實「三木建言」。福田總裁親自擔任「黨改革實施本部」的部長，稱爲「實施本部」，而非自民黨慣用的「推進本部」，可見福田總裁的決心與企圖心，以及自民黨危機的嚴重性。福田總裁主持的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三十三屆自民黨臨時大會通過了總裁選舉制度的修改，新增「總裁初選制度」（田中善一郎，1986：8）。此外，也通過解散派閥的基本方針，而既有的派閥也紛紛贊同解散派閥的措施，改稱爲「政策集團」，自民黨頓時出現了改革的新契機。[11]

[11] 田中派改稱爲「新總合政策研究會」，中曾根派改稱爲「政策科學研究會」，三木派改稱爲「政策研究會」，福田派則擁有「青嵐會」與「A 研（亞洲問題研究會）」，中間派閥（椎名派、船田派、舊石井派、舊水田派）則組成「自由政治評議會」。除了派閥改稱的政策集團外，加上既存的政策集團，例如「金曜會」（目的是研究各領域的政策，會長灘尾弘吉）、「平河會」（目的是提升政治家的政策立案能力，會長宮澤喜一）、「新風政治研究會」（目的是提出因應新時代的政策作爲，會長小坂德三郎）、「千代田會」（目的是改善自民黨派閥政治弊端的體質，會長小坂善太郎）、「青嵐會」（目的是改善日本與中華民國的關係，召集人中川一郎）、「AA 研」（亞洲非洲問題研究會，代表伊東正義）等，自民黨的政策集團出現活躍的現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初選制度的反效果

自民黨於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進行總裁選舉公告，福田赳夫總裁、大平正芳幹事長、中曾根康弘總務會長、河本敏夫通產大臣等 4 名紛紛表明出馬競選。總裁初選制度的主要爲，總裁初選制度是在各地方黨部舉行投票，黨員／黨友的選票每 1,000 票換算成一點，獲得最高點數的前兩位候選人進入總裁決選，而總裁決選是由黨籍國會議員進行投票。

自民黨藉由總裁初選的機會，積極擴大政黨的規模。「自民黨黨全國組織委員會」（委員長竹下登）以 200 萬黨員爲目標，而「自民黨國民運動本部」（中川一郎本部長）則以百萬黨友爲目標，積極招募新黨員與黨友。而在自民黨的擴大政黨規模運動中，派閥與國會議員實際上扮演關鍵的推動者的角色。各個派閥爲了自派首領或支持者能夠進入第二階段的決選，競相積極擴大招募新黨員，特別是擴大個人的後援會成員。依照總裁初選辦法的規定，黨員必須繳清兩年的黨費始具投票資格，所以國會議員爲了爭取新黨員的加入，代繳黨費成爲普遍的現象，而名單中出現重複登記或查無此人的情形亦所在多有，甚至出現自家寵物的名字，派閥競爭的激烈程度不言可喻。在一九七八年二月末的期限之前，自民黨黨員從 40 萬暴增爲 131 萬 9,091 名，黨友則增加爲 18 萬 1,160 名，合計 150 萬 251 名（竹下登，1991：106-107）。[12] 此規模雖然不及預先期望的 200 萬名，但卻是社會黨黨員的 4 萬 3 千名的 34.5 倍。朝野政黨基層黨員人數的大幅差距，是自民黨爾後維持政權的重要基礎。

在總裁選舉過程中，從各種調查資料顯示，現任總裁福田赳夫應最具優勢。因爲就歷屆自民黨政權觀之，福田政權堪稱佐藤政權以來的安定政權，並無重大的失敗政策，而且成功地締結日中（共）和平友好條約，打開日本在亞洲的外交局勢，而民生物價亦稱平穩。但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進行的第一階段初選結果，卻出乎意料之外，黨內基礎薄弱的小派閥首領大平正芳獲得 748 點，較福田赳夫的 638 點高出 110 點；此外，

[12] 派閥競相擴充基層支持，以增加自身派閥的實力，在競爭激烈下，出現黨員名單不實的現象，例如，黨員名單出現重複登記者，或是去世者的姓名，甚至出現寵物的名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曾根康弘獲得 93 點，河本敏夫獲得 46 點。福田赳夫受到打擊而宣佈退出第二階段的決選，因此大平正芳順利成爲新任的總裁（福田赳夫，1995：248-254）。

小派閥的大平正芳之所以會獲得最高的點數，原因是大平正芳取得自民黨最大派閥田中派的支持。亦即，派閥雖然改稱爲「政策集團」，但是隨著總裁選舉的實施，派閥又再度活躍政治舞臺。若從另一個角度觀之，儘管田中派身染「金錢政治」的污名，但是做爲最大派閥的田中派在「黨員擴大運動」中厚植雄厚的支持基層，藉由支持中派閥的大平正芳，實質上繼續支配著自民黨政權。實際上，田中派支配自民黨政治的現象不僅持續到自民黨下野之際，甚至在度過短暫的在野黨時期，再度回到執政黨地位時，田中派勢力依然維持著支配性的地位。例如，大平總裁之後的鈴木善幸、中曾根康弘總裁均受到田中派的支持而擔任總裁，之後的竹下登則是繼承田中派勢力的派閥首領，竹下登之後的宇野宗佑、海部俊樹、宮澤喜一也都是受到竹下派的支持而上台組閣。自民黨於一九九六年一月以聯合政權的形式重新取回政權時，自民黨總裁爲橋本龍太郎，其繼任者小淵惠三等，均出自田中派一脈，足見「田中勢力」對於日本政治的影響力。

更重要的是，雖然在中選舉區制度下，日本的政治向來就是利益誘導趨向，自民黨選舉已經與地方勢力及產業團體結盟，但是地方勢力或產業團體對於自民黨內政治尚無直接的影響力。但是透過總裁初選制度的實施，卻將此關係內化到黨內政治。誠如中村啓三研究指出，支撐自民黨政權的票源來自於全國超過 500 個業界團體的「組織票」，而業界團體則遍佈於全國、都道府縣，以及市町村等各層級（中村啓三，2003：89）。而荷蘭作家 Karel van Wolferen (1990: 123-131) 更指出，日本業界團體的縱向與橫向組織之細密，堪稱爲世界之冠，是自民黨權力構造的精髓。

但是，自民黨派閥勢力向全國擴大，雖然帶來自民黨政權的穩定，但是卻也同時蘊含著反效果。誠如山口二郎研究指出，雖然一九八〇年代是自民黨利益政治的全盛時期，但是自民黨政治家，特別是「族議員」卻僅重視與自身相關的特定利益政治，例如將中央政府的資源挹注到出身選區，或是援助特定的產業界，致使自民黨失去既往政治辯論的功能（山口二郎，2006：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自民黨的政治辯論功能可從派閥首領「輪流」擔任總裁的情形觀察，例如，岸信介總裁強行通過美日安全保障條約修改，引發日本社會嚴重的對立與不安（六〇安保鬥爭），之後繼任的是強調「寬容與忍耐」、「所得倍增論」以安撫社會浮動情緒的池田勇人總裁，政治方向的轉換相當明顯；又如，大力推動公共建設與投資的田中角榮之後，經過短暫的「清廉的三木總裁」，繼任的是主張財政重整的福田赳夫總裁（內田健三，1973：175-179）。換言之，總裁由政策路線不同的派閥首領輪替擔任，在自民黨內部產生所謂的「鐘擺效應」（政策辯論空間），賦予了自民黨在政策上自我調整的功能，是自民黨維持政權的關鍵。但是，日本政治在田中派的實質支配下，不僅失去政策辯論與論述的功能，而且金權政治的體質再度浮現，終使自民黨失去政權。

陸、二〇〇一年後的總裁選舉：政治改革與小泉革命的加乘效果

一、政治改革的潛在效果

自民黨於一九九三年下台後，繼任的細川護熙內閣完成的政治改革法案，對自民黨派閥的影響力產生抑制的作用。首先，就選舉制度改革而言，不論是小選舉區的單一候選人的決定，或是比例代表區的政黨名單的決定，主導權在總裁與幹事長等政黨高層，派閥的影響力大不如前。其次，新設置的政黨補助金方面，爲了改善選舉過度花錢帶來的弊端，日本國庫依照選舉得票情形，提撥補助金給政黨，再由黨中央統籌應用。因此，國會議員（派閥成員）降低了對派閥資金的依賴程度。最後，政治獻金管制法的修正則限制了企業與財界對政治家個人的政治獻金，政治獻金對象僅限於政黨，因此弱化了派閥首領募集資金的能力，同時也降低了對成員的拘束力（斉藤淳，2005：205）。

政治改革具有弱化派閥影響力的效果，但是未必立即顯現。例如，改善選舉花錢的效果方面，候選人在既往的中選舉區時，只要獲得固定比例的支持便可當選，特別是候選人經營的後援會與地方產業界的組織票。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在小選舉區之下，候選人的「顧客層」規模擴大且人數增加，選舉的花費仍舊居高不下，因此新選舉制度並未改善「金錢選舉」的弊端，金錢政治仍然餘灰未燼（草野厚，2008：122-124）。又例如，內閣人事安排方面，政治改革完成之後，從橋本龍太郎、小淵惠三、森喜朗等政權的內閣人事安排來看，派閥的影響力仍然存在。例如，第一次橋本內閣時，自民黨部分的小淵派、宮澤派、三塚派、渡邊派、河本派獲得的內閣職位數目分別爲 4、2、2、2、1，符合當時派閥勢力的比例；又如小淵內閣時，小淵派、宮澤派、三塚派、舊渡邊派、舊河本派獲得的內閣職位數目分別爲 5、5、3、3、2，亦與當時派閥勢力成正比。

政治改革效果雖然未立即顯現，但是制度上已經完備。政治改革的成功，必須「制度」與「行爲者」二者均備，方能竟其功。第八十七任總裁選舉中，小泉純一郎的勝出，補足了成功的要件。

二、小泉改革的意義

小泉總裁是一位強勢的領導者。但是，爲何小泉純一郎能夠發揮強勢的作爲？從本文的觀點來看，二〇〇一年四月的總裁選舉制度中，「重視民意」的制度修正，能夠提供有效的解釋。

首先，在二〇〇一年的第八十七屆總裁選舉中，地方黨部的選票從 1 票增加爲 3 票，47 個都道府縣總計 141 票，較當時自民黨在參議院的席次 103 席多出許多，此意味著「基層民意」的重要性，大過於國會的參議院，意義重大（五百旗頭真等，2007a：276）。

其次，除了廣島縣與山口縣之外的 45 個都道府縣，均舉行「總裁初選」，而且初選獲得黨員票最高票者，可囊括都道府縣的 3 張地方黨部的選票。「總裁初選」的普遍舉行，使自民黨總裁選舉更加貼近民意。

小泉純一郎掌握人心思變的潮流，以及不滿自民黨傳統政治的社會氛圍，大聲疾呼「即使自民黨瓦解也要進行改革」；同時，小泉將橋本派、江藤・龜井派等保守勢力定位爲反對改革的抵抗勢力，爭取黨員的支持。小泉的選舉策略奏效，順利當選總裁。小泉在總裁初選階段，獲得的地方黨部選票爲 123 票，高出勁敵的前首相橋本龍太郎（15 票）八倍之多，仰賴基層民意支持的國會議員追隨民意的動向，亦將過半數的選票投給了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泉（參見表 1），小泉順利當選第八十七屆自民黨總裁。

表 1　第八十七屆自民黨總裁選舉得票情形

	地方黨部代表	議　員　票	總 得 票 數
小泉純一郎	123 票	175 票	298 票
橋本龍太郎	15 票	140 票	155 票
麻 生 太 郎	0 票	31 票	31 票
龜 井 靜 香	3 票	初選後宣佈退出	
廢　　票	3 票	0 票	3 票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小泉不僅高票當選自民黨總裁，更在全國掀起小泉旋風，小泉內閣的民意支持度更創下歷史新高。根據『讀賣新聞』與『朝日新聞』在小泉內閣上台後，立即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內閣的支持率分別是 87.1% 與 78%，均創下該報社歷屆內閣支持率調查中的最高紀錄（福田赳夫，2001a；2001b）。小泉在民意的後盾下，積極推動改革，首要之務便是瓦解派閥的影響力。

派閥的功能主要在選舉、資金、人事等三方面發揮影響力，而在小泉政權期間，派閥的影響力受到嚴重的打擊。首先，選舉時的候選人推薦方面，新選舉制度原本已經壓縮派閥在候選人推薦時的影響力，小泉總裁更先後任命山崎拓、安倍晉三、武部勤等盟友或親信，擔任主掌選舉事務的幹事長，貫徹小泉總裁旨意，決定候選人。小泉總裁透過幹事長強力主導選舉事務，最著名的案例是二〇〇五年九月的眾議院選舉（郵政解散選舉）（大下英治，2005：250）。其次，資金方面，不論是政黨補助金或是政治獻金，均先流向黨中央，再由黨中央分配給各派閥。既往，黨中央依照派閥勢力的比例分配將資金，但是，小泉總裁上台後，減少了派閥應分得的資金額度，導致派閥在資金上出現窘迫的現象。例如，派閥僅能補助平時選區中的各項聚會或慶典儀式的部分經費，對於選舉時的龐大資金挹注，則無能為力（大嶽秀夫，2003：178）。最後，關於黨政人事方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小泉在組閣之際，對於內閣人事與黨三役等要職的安排，既不與派閥首領協調，亦不參照國會議員當選次數的多寡，更無視於派閥勢力比例等慣例，使得派閥的影響力無從發揮。

值得一提的是，小泉要瓦解的派閥，主要指的是當時的橋本派。例如，小泉之所以極力推動道路公團民營化以及郵政事業民營化，實乃因爲道路政策與郵政事業政策是橋本派的政治利益所在。然而，因爲橋本派源自於田中派，長久主導日本政治的運作，因此瓦解橋本派的政治利益結構，實質上也打破了田中支配的政治利益結構。無怪乎橋本派大老野中廣務直言指出，小泉當選總裁是田中派及其繼承勢力的徹底挫敗，因爲小泉的當選導致了「利益分配型政治」的瓦解（五百旗頭真等，2007b：281）。

三、派閥凝聚力的瓦解

一般所指派閥勢力的衡量標準是派閥對於內閣人事的影響力，以及分配內閣職位的多寡，然而派閥勢力之所以能夠發揮影響力，究其原因主要是派閥內部強固的凝聚力。派閥在選舉、資金、人事等三方面，對成員提供援助，建構起強固的凝聚力。然而，終究其原因實導因於自民黨執政的現實。在自民黨執政的現實下，自民黨總裁同時擔任首相，掌握了龐大的黨政資源，總裁遂成爲派閥首領極力奪取的職位，而派閥首領則強化選舉、資金、人事等三方面的功能，擴大派閥規模，鞏固派閥凝聚力，以強化爭奪總裁職位的能量。反之，若是自民黨政權出現危機，則派閥的凝聚力則將出現鬆懈的現象。

派閥凝聚力的鬆懈，在一九九八年七月的總裁選舉中已經出現；而小泉總裁出現後，派閥勢力則進一步地瓦解。

自民黨於一九九八年七月的參議院選舉中，在改選的 61 席次中，僅獲得 44 席次，自民黨遭受慘敗，總席次從 109 席減少爲 103 席，距離過半數差距愈大。加上自民黨在一九九六年的眾議院選舉中，亦僅得 239 席次，是繼一九九三年後，連續二屆眾議院選舉未過半數。橋本龍太郎在參議院選舉的挫敗下，引咎辭職。然而，自民黨在國會選舉接連遭遇挫折，逐漸失去一黨獨大的優勢，自民黨政權也出現嚴重的危機。

橋本的辭職，也直接引發所屬派閥，也是最大派閥小淵派的分裂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機。小淵派源自於田中派、竹下派，是自民黨的最大派閥，但是派閥成員小澤一郎與羽田孜於一九九三年離開自民黨，而橋本龍太郎又引咎辭職後，小淵派頓失足具領導地位的人物。在此危機下，派閥的凝聚力開始出現鬆動的現象，以致於總裁選舉中，出現「人人有希望」的想像。就在小淵惠三表明出馬競選新總裁下，同派閥的梶山靜六則以脫離派閥的形式競逐總裁職位。選舉結果，雖然小淵惠三以 225 票獲勝，但是梶山靜六卻獲得 102 票，較獲得三塚派全力支持的小泉純一郎的 84 票高出許多，足見小淵派做爲最大派閥的地位已經開始動搖。

小淵惠三於二〇〇〇年四月因病無法視事，森喜朗在「五人小組」的密室政治下成爲新總裁。五人小組包含森派首領森喜朗、小淵派代理幹事長野中廣務、小淵派的青木幹雄（內閣官房長官）、江藤龜井派的村上正邦（參議院議員會長）、江藤龜井派的龜井靜香（政調會長）等，均爲派閥的重要人物。「密室政治」的產物森內閣的民意支持度居下不高，催生者的派閥則成爲元兇。

在上述的環境下，加上小泉純一郎的出現，二〇〇一年四月之後的總裁選舉，已經鬆動的派閥凝聚力，進一步出現瓦解的現象。小淵惠三總裁選舉時，梶山靜六因競選而離開派閥，其支持者佐藤信二、菅義偉等也離開小淵派，但是派閥勢力仍然是總裁選舉票數的計算的單位，尚未出現派閥分裂投票的現象。然而，二〇〇一年開始的總裁選舉，派閥出現了分裂投票的現象。

二〇〇一年四月的第八十七屆總裁選舉時，堀內派採取成員自主性投票的立場，而橋本派在推出前總裁橋本龍太郎出馬競選下，大村秀章等當選一次或二次的青壯派成員卻主張應世代交替，公開表明支持小泉純一郎（福田赳夫，2001a）。團結程度一向被視爲固若磐石的橋本派，選舉時內部首度出現內部對立的現象。小泉純一郎於二〇〇六年九月任期屆滿，自民黨舉行第九〇屆總裁選舉時，津島派（前身爲橋本派）、山崎派也採取成員自主性投票的立場（福田赳夫，2006）。自民黨於二〇〇七年九月舉行第九十一屆總裁選舉時，自主性投票的派閥除了津島派、山崎派外，更擴大到伊吹派、古賀派、高村派等主要派閥。而第九十二屆總裁選舉時，除了津島派、古賀派、山崎派之外，現任總裁派閥，同時也是最大派閥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町村派（前身爲森派，小泉純一郎出身的派閥）也出現分裂投票的現象。（福田赳夫，2008）。[13]

自民黨於二〇〇九年八月的眾議院選舉大敗，失去政權後，麻生太郎總裁引咎辭職。而於二〇〇九年九月舉行第九十二屆總裁選舉時，古賀派的谷垣禎一、西村康稔（原屬町村派，宣布參選時退出派閥）、麻生派的河野太郎等三名角逐總裁職位，派閥成員自主性投票的現象依舊，最後由谷垣禎一勝選取得總裁職位。重要的是，三位候選人均於競選期間，強調將致力於壓制派閥的影響力，不依照派閥勢力決定政黨人事（福田赳夫，2010）；再者，此次選舉首度出現候選人均非派閥領袖的現象，顯示出自民黨總裁選舉世代交替的新樣貌，然是否能夠一新自民黨政治，尚須時間觀察。

柒、結　論

既往的研究將總裁選舉與結果視爲派閥競合的結果，而本文研究發現，自民黨派閥起源於自民黨總裁的選舉，而且，也正因爲如此，派閥的勢力亦將隨著總裁選舉制度的轉變而出現消長現象。

僅以本文設定的四個問題意識，總結從總裁選舉分析派閥勢力的集結與消長。第一，自民黨成立之際，雖然已經制訂了總裁選舉機制，但是創立自民黨的二股勢力相互對峙，互不相讓，導致政黨領導人無法產生，此亦爲自民黨成爲派閥集合體，「分權式組織」的肇因。第二，自民黨總裁在真正的競選下誕生，要到一九五六年總裁選舉之際。而此次的總裁選舉，導致「派系」出現質變，從既往的「志同道合伙伴關係」，變成「首領與成員的上下關係」，首領成爲派閥活動的主要核心；再者，「派系」在選舉過程中整合成爲「八個師團」，成爲自民黨派閥的原型。第三，自民黨企圖藉由總裁初選制度消除派閥政治，但結果卻將地方勢力與利益團體的影響力，引進政黨內部政治，加上派閥勢力的擴散，派閥政治的影響

[13] 小泉純一郎、前幹事長中川秀直、前防衛廳長官衛藤征士郎公開支持小池百合子，町村信孝、森喜朗、安倍晉三、前文部科學大臣中山成彬、前財務大臣尾身幸次等人士則支持麻生太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力不減反增。最大派閥的田中派雖然染上金錢政治的污名，但是透過支持其他小派閥成員擔任總裁，在實質上支配著日本的政治決定過程。第四，小泉純一郎就任自民黨總裁後，在小泉總裁發揮政治手腕，以及政治改革效果的浮現下，壓縮了派閥在人事、選舉、金錢等方面揮灑影響力的空間，致使政治利益共享的結構瓦解，派閥的凝聚力因而鬆垮。自民黨再度下台後，總裁選舉出現世代交替的現象，自民黨是否因此而出現新氣象，增加政治的可塑性，尚須要時間來觀察。

然而，派閥在選舉、人事、資金上的功能衰退之後，取代派閥功能的新遊戲規則尚未成形，這也是強人首相小泉純一郎之後，歷任首相步履蹣跚的主要原因之一。「派閥」是政黨政治的「惡」，或是必要之惡，抑或是活化政黨政治的要素，在自民黨二度下台的今日，是值得重新省思的課題。

參考書目

小堺昭三，2008，《自民党総裁選》，東京：ブッキング。

大下英治，2005，《郵政大亂：小泉魔術》，東京：徳間書店。

大嶽秀夫，2003，《日本型ポピュリズム：政治への期待と幻滅》，東京：中央公論新社。

川人貞史，2001，〈日本の政党間競争と選挙〉，川人貞史、吉野孝、平野浩、加藤順子（編），《現代の政党と選挙》，東京：有斐閣，頁 127-152。

内田満，1987，〈鳩山一郎内閣・石橋湛山内閣〉，白鳥令（編），《日本の内閣 II》，東京：新評論，頁 163-186。

內田健三，1973，《派閥》，東京：講談社。

中村啓三，2003，〈解散風で明確になった自民党と公明党の切れない関係〉，《エコノミスト》，頁 88-89。

中村隆英，1993，《昭和史 II：1945-1985》，東京：東洋経済新報社。

井上義久，1979，《派閥と政策集団》，東京：教育社。

山口二郎，2006，〈総裁選から見える自民党の末期現象〉，《世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757: 66-71。
五百旗頭真、伊藤元重、薬師寺克行（編），2007a，《野中廣務：権力の興亡（九〇年代の証言）》，東京：朝日新聞社。
五百旗頭真、伊藤元重、薬師寺克行（編），2007b，《森喜朗：自民党と政権交代（九〇年代の証言）》，東京：朝日新聞社。
田中善一郎，1986，《自民党のドラマツルギー：総裁選出と派閥》，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田中善一郎，2005，《日本の総選挙：1946-2003》，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石川真澄，1978，《戦後政治構造史》，東京：日本評論社。
石川真澄，1984，《データ戦後政治史》，東京：岩波書店。
白鳥令，1977，《保守體制（上）》，東京：東洋経済新報社。
立花隆，1974，〈田中角栄研究：その金脈と人脈〉，《文芸春秋》，52(12): 92-131。
竹下登，1991，《證言：保守政権》，東京：読売新聞社。
宇治敏彦，2001，《首相列伝：伊藤博文から小泉純一郎まで》，東京：東京書籍。
伊藤昌哉，1982，《自民党戦国史：実録》，東京：朝日ソノラマ。
伊藤昌哉，1985a，《自民党戦國史（上）》，東京：朝日新聞社。
伊藤昌哉，1985b，《自民党戦國史（下）》，東京：朝日新聞社。
足立利昭，1984，《ざ・自民党：長期政権の秘密》，東京：翼書院。
舛添要一監修，1995，《検証戦後 50 年政治編》，東京：サンドケー出版局。
佐藤誠三郎、松崎哲久，1986，《自民党政権》，東京：中央公論社。
岸信介，1983，《岸信介回顧録：保守合同と安保改定》，東京：廣済堂。
斉藤淳，2005，〈中選挙区制における自民党黨議員の差別化戦略〉，《レヴァイアサン》，37: 203-207。
岡義武，1966，《現代日本の政治過程》，東京：岩波書店。
建林正彦，2004，《議員行動の政治経済学：自民党支配の制度分析》，東京：有斐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神島二郎，1985，《現代日本の政治構造》，東京：法律文化社。
草野厚，2008，《政権交代の法則：派閥の正体とその変遷》，東京：角川グループパブリッシング。
宮坂正行，1973，《政府・自民党・財界》，東京：三一書房。
野中尚人，2008，《自民党政治の終わり》，東京：筑摩書房。
奥島貞雄，2005，《自民党幹事長の 30 年》，東京：中央公論新社。
奥島貞雄，2006，《自民党総裁選：権力に憑かれた亡者たち》，東京：中央公論社。
富森叡児，1994，《戦後保守党史》，東京：社會思想社。
鈴木基史，2007，〈選挙制度の合理的選択論と実証分析〉，《レヴァイアサン》，40: 139-144。
福井治弘，1969，《自由民主党と政策決定》，東京：福村出版社。
福田赳夫，1995，《回顧九十年》，東京：岩波書店。
福田赳夫，2001a，〈自民党総裁選　小泉地滑り勝利の背景　議員の浮動票も流れる〉，読売新聞，4/25，4。
福田赳夫，2001b，〈小泉内閣支持率 87%　自民に「小泉効果」／読売新聞社世論調査〉，読売新聞，4/29，3。
福田赳夫，2001c，〈小泉内閣支持、最高 78%　改革路線に期待感〉，朝日新聞，4/30，2。
福田赳夫，2006，〈自民党総裁選　津島、山崎派自主投票　各派対応、ほぼ出そろう〉，読売新聞，8/25，4。
福田赳夫，2008，〈自民党総裁選で町村派に亀裂、麻生・小池支持で二分〉，読売新聞，9/12，4。
福田赳夫，2010，〈谷垣氏、議員表で過半数〉，読売新聞，2/4，4。
Wolferen, Karel van 著，筱原勝譯，1990，《日本／権力構造の謎》，東京：早川書房。譯自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People and Politics in a Stateless Na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Growth and Decline of Factions Within the LDP:

A Perspective on the Electoral System for the LDP President

*Ming-shan Wu**

Abstract

In the fifty-four years before it lost power for a second time in 2009, the LDP president normally also served as prime minister and dominated Japanese politic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LDP was in power alone or as part of a coalition government. The only exceptions were the cabinets of Morihiro, Tsutomu and Tomiichi (a total period of two years and three months). Since the LDP dominated the machinery of government, the president had control over both government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party. LDP factions were formed with the purpose of winning the position of president. LDP politics was defined by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factions as each group sought to maximize its own advantages.

In previous research, the LDP presidential election, as a dependent variable, is highly connected with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factions. However,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factional politics is not a variable which explains the LDP presidential election, but rather is a product of the current electoral system. It also argues that the rise and fall of factions has a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outcome of presidential elections.

From observation of three important phrases of the LDP presidential election—the first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adoption of presidential primary election and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fter the 87th session—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formation, growth and decline of factions within the LDP, and tries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on factional politics within the party

Keywords: LDP President, Fac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Reform, Policy-Making Proces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I-Shou University. E-mail: meizyou@is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